

25

情系红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 第五十一辑

情 系 红 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7年·昆明

(滇)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 杨 澄
封面摄影 陶松生
封面设计 李忠翔
封面题字 杨修品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一辑
情系红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邮编: 650011
昆明地质印刷所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 插页: 5 字数: 300 000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ISBN 7-222-02243-0/K·254 定价: 23.00 元

主 编	刘 邦 瑞		
副 主 编	张 鑫 昌	何 文 贵	
执行主编	蒲 元 华		
编审人员	孙 锐	蒲 元 华	丁 蜀 滇
	吕 志 强	王 小 晓	

EC80/31



1956年12月16日，周恩来总理在德宏州芒市广场参加中缅两国边民大联欢。



从美国归来的缪云台和西双版纳少数民族学生在一起。



1993年12月，云南省人民政府吴光范秘书长专程赴港向伍集成先生颁发省政府顾问聘书



伍集成先生捐助奖金给腾冲故乡的教师和学生。伍宗琳代表父亲在捐赠仪式上，省政协主席刘树生向宗琳致送感谢状。

目 录

我的回国定居	缪云台 (1)
拳拳爱国心	张作为 (9)
我所知道的五位海外赤子	马宝忠 (19)
邵逸夫先生捐资助教散记	胡立耘 (33)
陈嘉庚与华侨机工	庄明理 (37)
华侨领袖梁金山爱国爱乡事迹	何开明 (46)
忆学者、翻译家马坚	林震宇 (53)
叩开神秘的太空之门	

——记中国科学院院士、空间技术专家王希季

.....	曹 青 (66)
爱国侨领许仁钦先生	许冰谷 (95)
先父李任卿传略	李镜天 (100)
爱国华侨马铸材与张德辉	尹源举 (109)
怀念张相时老人	李松波 (115)
爱国华侨钱仿周	赵春洲 (119)
爱国台胞申庆璧先生	王 樵 (123)
爱国华侨田守忠先生	张道源 (132)
我所知道的马荣杰与朱勉生	许寰儒 (137)
纳西族的海外巾幗——杨丹桂	李家华 (148)
云南卫生防疫战线的先驱郑玲才	杨育彬 (154)
侨胞刘玉超先生	寸茂鸿 (160)

昆明市侨联主席刘国生	崔宗云 (164)
忆朱鸿题博士	朱鸿运 (171)
印尼归侨李传提	谢品岱 (180)
从印尼归来的黄水清	赵 彤 (185)
留法美术家廖新学	吕世华 (188)
勋劳卓著的南侨机工	林鼎纯 (195)
在云南的南洋华侨抗日壮士	陈坤华 (207)
腾冲旅缅华侨对抗战的贡献	李和仁 (216)
旅缅华侨抗日爱国行动亲历记	刘宏源 (220)
澜沧江畔争天下	王 松 (225)
泰国归侨面对的严峻考验	吴祥祉 (232)
云南留学生在埃及	沙德珍 纳钟明 (237)
腾冲怒江剧团赴缅甸宣传抗日 李发坤 高尚琴 袁文亮 (243)	
缅甸华侨回国观光团	明其德 (248)
回忆致公党云南省小组时期	李小峰 李松波 (252)
记里昂中法学院恢复始末	刘崇智 田 颖 (256)
中国在国外创办的第一所正规中医学院 ——“加泰罗尼亚·云南”中医学院 郑 进 黄利民 (262)	
中医在美国	张峻达 (268)
缅京云南会馆与旅缅和顺联谊会	尹文和 (272)
云南旅港同乡会	李静忱 (281)
台湾的云南同乡会	杨国粹 (288)
我记忆中的侨乡和顺	寸希廉 (296)
乡情记事	杨光明 (303)
难忘的台昆青年交友会	张瑞中 (311)
40年前的中缅边民大联欢	赵家富 许襄儒 (318)

情系灾区 竭力援助

——丽江“2·3”大地震赈灾纪实 吕志强 (321)

赤子情长

——'97 香港采访记 董保延 (330)

我的回国定居

缪云台

1973年我应周恩来总理之召，第一次回国观光。我和周总理是在重庆开旧政协时认识的。他听到我在国外茶余酒后与朋友闲谈中，时常谈起国内情况，向往祖国，向往社会主义，便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的祁峰同志托我的亲戚朱希贤去美国时带信给我说，希望我能回国看看，并说明随行人数多少不限，全部由公家招待。

我于8月由纽约动身，经香港进入祖国。祁峰同志陪送我到深圳之后，由国务院专程接待我的人陪我到广州，再到北京。这次和我一起回国观光的，还有我的女儿瑜成以及住在香港的外孙女朱虹和他的丈夫陈静波。

初到广州，我便感到耳目一新。人们的衣着整洁朴素，特别是人们的身体非常健康，个个面色红润，完全找不到“东亚病夫”的迹象。当晚我住在东山一个招待所，据说这里原是达官显宦的俱乐部。次日，革委会派人陪同我参观了中山纪念堂、农民运动讲习所、广东博物馆等地方。中山先生纪念堂布置得庄严肃穆，修整也很好，使我感到中共仍尊重孙中山先生，认为他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者。农民运动讲习所面积不大，布置十分简朴，但就在这样的地方培养了大批的农运干部，这使我感到毛主席的高瞻远瞩，令人倍觉钦佩。我刚刚回到祖国就首先看到毛泽

东思想的源泉所在，非常兴奋。

我在广州只停留两天，但印象十分深刻，它与香港只一水之隔，但却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

第三日下午，我由广州乘飞机经上海到北京，晚9时到达，下榻于北京饭店。这个饭店我在1919年初次来北京时曾经住过，住下后才知道当年这所十分考究的饭店，已经很不够用，我所住的房间是建国后新扩建的，比原来的大了许多。在北京会见了一些过去的老朋友。在参观游览几天之后，我向安排我活动日程的周康仁处长和陈理同志提出：准备用两个月的时间到各地参观，并且表示要以工农业生产和水利为主。因为我在国外时听说国内的工农业生产发展很快，所以想多看看这方面的情况。我这次回国参观了大庆、大寨、鞍山、抚顺、江苏等许多地区，对祖国变化如此之大，确实感到惊讶。这不仅超出了我个人的想象，我想所有居住在国外的人都不会想象得到。我们的国家确实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和旧社会那种贫穷落后的现象，简直不能相比。我是一个办企业的人，源深懂得这个成就是多么不容易。

这次回国观光不仅使我大开眼界，对祖国有了深刻的认识，而且也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过去我只是从主义、思想、目标来理解共产党，而这些活生生的事实，却深深地教育了我，我觉得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这样大的成就。尽管当时祖国正处在动乱时期，政治、经济各方面都受到很大阻挠和破坏，但对我这个侨居海外多年的人来说却仍感到是换了人间。

这次回国观光我得见周总理，并蒙他的邀请去北戴河休息，在那里我又会见了朱德委员长。这次观光之后，我于10月回到纽约。

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的噩耗传到美国后，我们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在纽约举行了一次隆重的追悼会。会议由我主持，参加的华侨与华裔有千余人。许多侨生在海外的青年都掩面而泣，尽管他们没有回过祖国，并未康周总理见过面，但他们对周总理一

生的光辉事迹知道得很清楚，对祖国失掉了这样一位伟大的人而悲痛。

我于1976年10月第二次回国观光。我刚到广州就听到粉碎“四人帮”的消息。这次参观除了去新疆、四川等地之外，主要是回了一次家乡。家乡的变化更加使我惊异，过去的边远落后、交通闭塞的云南，不仅工农业生产发展很快，交通也大为方便，有铁路可直通内地了。我过去经营过的小水泥厂，当时产量不过5 000吨，现在已经扩建成一个大厂，产量已达10多万吨。家乡的变化更加牵动了我这颗游子之心。当时正值“四人帮”被打倒，全国人民人心振奋，家乡人民也沉浸在无限喜悦之中，这种情绪也深深地感染着我，使我这个并不会做诗的人也抑压不住自己的喜悦心情而诗兴大发。我当时曾赋诗一首表达了我的心情。

雨过天晴着神爽，云开雾净远峰明。

车行蜿蜒向前进，万岭千山路坦平。

昆明过去交通极不方便，我在云南多年，去内地都要乘滇越铁路走海防，而现在成昆铁路修起，可以一直通往内地。我听说成昆铁路工程十分艰巨，就特意从昆明乘火车去成都，果然亲眼见到这样一条长达1 100公里的铁路线上，竟有300多个隧洞，工程之艰巨可想而知，我在感动之余，又赋诗二首：

(一)

重重叠叠万重嶂，想见当年远征难。

若非革命为群众，哪能赢得大凉山。

(二)

社会建设举世钦，洞山跨水只等闲。

亿万人民同心干，成昆铁路舞滇川。

在从成都到桂林游览时，我又写了一首六言诗：

四围奇峰起伏，写出历史画图。

漓江水平如镜，注入五洋大同。

我一生极少写诗、作文，是祖国的山河、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使我产生了这种激情。

两次参观加深了我对祖国的了解和热爱，1979年6月我回国定居了。到北京后，我首先到美国驻华大使馆声明放弃美国国籍，恢复中国国籍。我真正成了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的一员。

最近，我又写了一首七绝《述怀》：

老来学诗颇自嗟，已将岁月付锡砂。

每喜年年春长在，留得晚晴吟红华。

这可算是我回国定居后的心情写照。

全国政协文史办公室要我写回忆录，并派专人前来协助整理。我觉得应该写，但过去积累资料甚少，许多事情因时间太久已经记忆不清、又缺少经验，只能用记事体裁把一生中几件重要的事，记录下来。

云南地处边陲，交通不便，文化晚开，较之沿海之各省落后许多，又长期处在英法两大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压迫之下，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侵略的手段，如修铁路、设银行、开矿、做生意，在云南样样俱备。在云南这样一种条件下，想谋求一些事业上的发展，实具一定的困难。我是云南的公费留美生，回国后，我只想就自己所学的粗浅知识，服务于地方。在当时的环境下，我之所为，基本上是本着这样两项宗旨：1. 根据当时当地人民之需要，多做些建设性工作，以改变云南的落后面貌；面对旧社会的贪污腐化、唯利是图，保持洁身自爱，不合作、不苟同。当然，这样做也带来了我事业上的孤立。在云南与我合作的人不如反对我的人多。2. 不屈服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压迫，在与帝国主义分子的斗争中打开工作局面。由于当时云南情况特殊，国民党政府鞭长莫及，我努力做到在与帝国主义分子的斗争中顾全大局，听命政府，不搞独立，在顾全大局的情况下，求得自主。多年来，从

我毕业后，自愿到个旧锡务公司工作开始，到成立云南人民企业公司为止，我的事业都与锡矿有关。但除去个旧的工作外，又都不是我的本行，而是通过工作，逐渐摸索。我的工作虽没走过弯路，一帆风顺，但我在云南政敌不少，我是在对内对外斗争的夹缝中寻找空隙，做了一点建设事业。

回想我这一生，虽然做了一些事情，但所做多属零星小事，同有些人的事业比起来，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本来不值一记。但多少年来在我所处理的一些问题上，就其性质来说，却有它独特之处，因为它不是遵循当时一般企业、事业家所认为应该走的道路去做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特别是在边远落后的云南，走这样一条路并不容易，可以说是带有一定的创造性、革命性、因此也就有点与众不同的特点。我的一生可得而言之者，如此而已。譬如：

1. 在改良炼锡的问题上，我不仅提高了产品质量，使其达到了国际水平，而且把原来租界、殖民地中间商人的剥削，一扫而光，使个旧的大锡直接进入伦敦国际市场。云南这样一个偏远省份的一个小城市个旧能和伦敦市场直接贸易，在 20 年代来说，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外国也是少见的。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势力统治下，在不平等条约控制下的中国，更不容易做到。

2. 在整理云南金融问题上，我的做法是违背常情的。如按照一般的做法，滇币贬值则要充实滇币的信用，需要把币值恢复到一比一（一元滇币等于一元港币或一元国币）。我却用贬低币值的方法，把滇币的币值降到一个合平云南当时的经济、商业来往的价值上。掌握着币值低有利于出口这一点，不仅使新滇币成为稳定、有信用的货币，同时也有力地控制了外币在云南的大量滇通，稳定了云南货币的地位。

3. 富滇新银行做为省银行，但主动拒绝代理省金库，超然独立于省财政系统之外，这也是当时全国各个省所没有的。但在云

南的具体条件下，这样做确实稳定了云南的货币和金融。

4. 在举办入口货特捐问题上，当时这样做是违反不平等条约的，因而引起帝国主义分子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但由于当时云南实际是一个半自主的省份，中央政府鞭长莫及，他们的抗议没有结果，我们虽冒了一点风险，但收到了实效。不过在当时全国各省中也只有云南做到了这一点。

5. 在管制外汇问题上，把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的势力从云南赶出去。云南过去控制汇率的权掌握在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手中，由于我们控制了牌价，能够同东方汇理银行竞争，因而把它历来经手的海关款、盐税款的特权拿了回来，使他们的生意清淡了，堵住了活动资金的来源，因而不得不撤销分行，使越币不能像从前那样在云南境内通行，使得东方汇理银行不能像天津、上海的汇丰银行，东北的正金银行那样，控制我们的金融经济。多年来，我时常想，云南与东北的情况相似，都是地处祖国边陲，都是在两大帝国主义势力侵略之下，云南是英、法，黑龙江是日、俄，但是两者情况却完全不同。东北的经济长期被日、俄操纵。而在云南，英、法势力不能得逞，他们想向锡矿投资，却始终一个钱也没能投进去。这不得不说是我们斗争的胜利。

6. 云南的经济委员会不是行政机构，它是专门管理企业业务的机构。这种把业务机构和行政机构分开的做法，也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做法。我在云南兴办纱厂也与众不同，一般办纱厂都是在盛产棉花的地方，而云南恰恰不产棉花，要靠进口棉花来纺纱。我们的做法是用进口洋棉代替进口洋纱，同时用建立纺纱厂来刺激本地农民种棉的积极性。

7. 在成立“民有、民营、民享”的人民企业公司问题上，应该说更是一个前所未有创举。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到新中国成立前为止，在新式企业中有商办、官办、官督商办等种种形式，但没有一个能像人民企业公司这样的官办企业，而真正由全省人民

所有。在旧社会它可以说是独此一家。它可以说是一个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企业。人民企业公司的做法我不是仿照，完全是创造出来的。

8. 我一生与外国人打交道很多，一种是与他们斗争，一种是使他们为我服务。凡是在我手下工作过的外国人，都非常忠实，听命于我，甚至帮助我同帝国主义分子的不合理的地方进行斗争。我的做法是我是主人，外国人是雇员，我利用他们的技术，洋为中用，是一个打倒洋行买办的模式，与那时听命于外国人的一些买办的做法完全相反。

我一生不愿做官，只想规规矩矩做点事，因此在我初回国时，尽管亲友们希望我到官场谋个一官半职，我却自愿去了个旧锡矿工作。以后的几十年中我也尽量不卷入政治漩涡。记得抗战期间规定，凡是做省府委员的，一定要加入国民党，但我不愿入党，所以那时在云南只有我一个省府委员不是国民党员。提起当时的国民党，实在使人头痛，从省党部、县党部的人员来看，都是一些行为不正，无事生非，老百姓所不齿的人。我不仅自己不入党，在我所负责的机构中，除了合作金库之外，都没有接受过国民党的调训，国民党员也很少。我也没有加入其他党派，始终保持一个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当时对于民盟的主张我很支持，有时也帮些忙，但我没有加人民盟。

我的朋友很多，各个党派都有，但我和他们都只有私人友谊。张群任行政院长时，我应邀任政务委员，也只是因他和我私交甚好，想帮他做些事，并且只希望帮一段时期。因为我愿多为云南地方经济建设服些务。华岗在昆明有电台，通过罗隆基的介绍我认识了华岗，我曾暗地保护他，但当时我对共产党并不了解，只知道他们是革命的，艰苦奋斗的，特别是因为我对国民党不满，所以凡是站在国民党对面的，我就支持。张君勱和我的私交也很好，但只是一般道义朋友。我有中国传统的旧道德，又接受了一些高